

功在当代 泽被后世

——评沈本《三国演义》

○郑铁生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传世之作，对这部民族瑰宝的版本的研究和整理，在当代我国学术界取得重大成果并引人瞩目的，首推全国著名《三国演义》研究专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沈伯俊先生。他从八十年代初就独撑大旗，大声疾呼：重新校理《三国演义》。并为之焚膏继晷，孜孜不倦，披览史册，旁搜博采，笔耕不辍，推出《三国演义》普及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年版）、毛氏本（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2年版）、嘉靖本（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3年版）和李卓吾评本（巴蜀书社 1993年版）四种版本的校理本或者整理本，并在校理的基础上，又推出《三国演义》评点本（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5年版）。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称其为“《三国演义》版本史上的新里程碑”^①。沈本《三国演义》是迄今校理最为精详也最为完备的版本，无论是这项浩瀚的工程本身，还是对研究国学、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三国演义》版本史上的两次飞跃

《三国演义》问世以来，传抄刊刻的版本形成了复杂的演变过程，而且形成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三国志传”两大版本系统。这种复杂的版本现象直到清代毛纶、毛宗岗父子修订、点评《三国演义》，犹如金圣叹之《水浒传》一样，才战胜了以往的一切旧本，从此这部小说遂以毛氏的修订本为定本而广为流传。毛本《三国演义》独领风骚的原因，概而言之：

第一，通俗长篇小说得到像李卓吾、叶昼、金圣叹、毛宗岗这样文化层次较高的文人的整理和评点，标志着俗文学与雅文学的融合，这不仅是时代风气使然，而且客观上提高了小说文本的价值。从此，毛本结束了《三国演义》从创作到刊行经历的漫长的版本变异阶段和刊行粗糙的现象。

第二，通俗长篇小说文本价值的表现形态得到空前完美的体现。毛氏父子对《三国演义》的整理和修订是全方位的。增删情节、削除论赞、精改诗词、修正文辞、整理回目，使小说文本的体制形式和艺术表现都趋于完美和精致。

第三，对通俗长篇小说文本价值的追求，与小说评点理论是同步进行的。官刻的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曾经进行过修订，但其目的是把那些“失之于野”且“士君子多厌之”的

^① 关四平：《〈三国演义〉版本史上的新里程碑》，《学术交流》1993年第3期。

成分修订成为适合“士君子”雅趣的成分。而毛氏的修订则不然，是将批评鉴赏、理论建构、文本增饰和艺术表达融为一体的审美活动，因此说他们整理、修订小说文本是在小说评点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毛氏的评点是受到金圣叹评点理论的影响而踏出了一条自己的路数，虽然其艺术眼力逊于金圣叹，但毕竟是他们智慧的结晶而建树了评点理论形态，体现出那种多层次多元化的文艺批评、审美鉴赏和叙事语法一体的文化传统。而其中整理文本正是体现这种文化品位的系统工程。

由上所述可知，毛本《三国演义》成为三百余年来流传最广并最具权威性的一个版本，可以说是《三国演义》版本史上的第一次飞跃。

毛本《三国演义》之后，对《三国演义》版本的研究几乎是断层。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先后发现《三国演义》数种主要版本，震动了当时中外学术界。学者们惊喜异常，许多学者投入对《三国演义》的研究和考证之中。其中郑振铎先生最为活跃，最为投入，他曾说：嘉靖本等一系列版本的发现，“这对于中国小说的研究者是如何巨大的一个消息呢”^①。并为之发表了重要的长篇文章《三国志演义的演化》，其权威性影响了半个世纪。其间对《三国演义》中存在的错误，现当代一些学者也或多或少地指出过。五十年代初顾学颉等学者对《三国演义》进行了校补工作，出版了为广大人民群众阅读方便的《三国演义》普及本。其校订主要是四个方面：（一）引用成语错误的；（二）与事实不符的；（三）地名错误的；（四）与文意不合，或字有错误的。增补有两个方面：补足漏字的；补足文意的。这一校补工作，为《三国演义》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普及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其功不可没。不过遗憾的是还没来得及向前迈出更大的步子，一股愈演愈烈的极“左”思潮便波及到了这部伟大的著作，使《三国演义》沉入冷宫达二十年之久。

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中期，伴随国内外对《三国演义》版本考辨的新发现，动摇了学术界传统的定论。与此同时，国内掀起了“三国热”。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文化氛围下，沈伯俊先生致力于《三国演义》版本源流的数年研究中，发现“现存的《三国演义》版本存在着大量的‘技术性错误’——指那些并非出自作者的创作意图，并非作品艺术虚构和艺术描写的需要，而纯粹由于知识的局限，由于作者一时笔误或者传抄、刊刻之误而造成的，属于技术范畴的错误。这些错误大致可以分为五类，总数至少在八百处以上，这是相当惊人的！”^②而且从这一现象，看到了问题的严肃性和现实性。他说：“今天，《三国演义》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而且在世界各地也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可以肯定，在未来的岁月里，无论是我们的子孙后代、海外华人，还是国外汉学家以及其他对中国感兴趣的朋友，凡是想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人，都将把《三国演义》当作必读书。然而，书中存在的如此大量的‘技术性错误’，却形成了某些障碍，使现有的《三国演义》版本难以充分适应海内外广大读者的多方面需要，也给《演义》的翻译带来一定困难。”^③从这一段话中，我们不难体味到沈先生不仅仅强调对《三国演义》版本考订和研究的学术价值，而且考虑到面向现实，面向广大读者，面向弘扬民族文化，面向中外文化交流的现实意义。正是这样一

① 郑振铎：《嘉靖本三国志演义的发觉》，《郑振铎文集》第五卷，第223页。

② 沈伯俊：《三国演义》校理本“前言”，第13页。

③ 沈伯俊：毛本《三国演义》整理本“前言”，第10页。

种指导思想,使他将全部心血和多年光阴倾注于对《三国演义》几种主要版本的校理。

沈氏《三国演义》校理本的主要特征是:

(一) 现有《三国演义》诸本大量的“技术性错误”,犹如健美体魄上大大小小的斑点和污痕,远观或粗视不以为意,仔细端详则慨叹美玉多瑕。从版本演变的历史审视,《三国志传》诸本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两大版本系统刊刻粗芜错讹之处,毛本《三国演义》没有能够彻底地全面地校理,特别是人物称谓、职官地名、历法年月等这些细微之处,或许历代的评点家对此也不太注意,或许那些文人的文化层次还没有达到这样审视的眼光。不管什么样的原因,这就为今天的审视和校理提供了一个空间,说到底,仍然是文本价值问题。沈本《三国演义》校理了八九百错讹之处,以崭新的姿态重现民族瑰宝的光彩,其校理之全面、校理之精细、校理之准确在《三国演义》版本史上独步当代,无出其右。

(二) 沈本《三国演义》校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文化观照。虽然校理之处都是细小的问题,但它总体上却表现了文化视野,而且始终集中于历史原型与小说历史真实“异质同构”在形式的准确性上。它不仅没有干预小说家主体性对历史真实的深刻参与和调节作用,相反,更进一步强化这种深刻参与和调节作用对历史文学的真实含量和真实品性的追求,特别是表达层面上细微之处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唯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沈本《三国演义》的版本价值和文学价值。

(三) 沈本《三国演义》对文本价值的贡献与他的评点理论是分不开的。其评点理论除了表现在校理本的几篇序言而外,集中体现在《三国演义》评点本那长达25万字的评析文字之中。其评点的形式分为回前总评、文中夹评和回后尾评,内容上大致可以这样界定:总评概述本回主要人物或主要事件,并针对历史著作对历史原型的记载,指出小说家主体的能动参与和调节,创造出哪些具有历史真实的审美形象;夹评主要对正文中的精彩之处或读者容易忽略、不易理解之处予以分析;尾评则以点睛之笔勾勒本章回的叙事艺术技巧,以及达到的艺术欣赏效果。前后呼应,既让人知道一个故事是怎样形成的,又让人明白是如何讲述的,理论思维一脉贯通。

由于沈本《三国演义》文本价值达到了极高的品位,因而校理本一出版,立即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许多著名学者一致给以高度评价。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陈辽撰文指出:“沈本《三国演义》是迄今为止《三国演义》版本中真实性、学术性、科学性最强的一个本子。”他还说:当年“毛本一出,其他版本的《三国演义》从此不再流行。我相信,沈本的出现,将在今后逐步淘汰现有的以毛本为基础的各种《三国演义》版本。”《三国演义》研究专家、广西社科院研究员丘振声指出:“《校理本三国演义》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南开大学教授、著名古代小说专家朱一玄致信沈伯俊:“您在《三国演义》研究方面有了如此大的成就,必为海内外学界所敬仰。”美国纽约大学教授、《三国演义》英文版翻译者罗慕士致函称:“您对《三国演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对您表示敬佩。”日本著名学者、《三国演义》日文版翻译者立间祥介教授也认为,沈本《三国演义》的注释“远远超过了迄今为止的诸种注释,今后我也打算参考您的注释,重新修改一下日文版《三国演义》。”

如果说在《三国演义》版本史上出现过两次飞跃,那么一个是毛本《三国演义》,另一个就是沈本《三国演义》。这将随着岁月的大浪淘沙不彰自明。

二、校理是对历史小说真实程度的全面修订

沈伯俊先生在以毛本《三国演义》为底本进行校理时，修订了五大类错讹：（一）人物错误，包括人名、字号、身份、人物关系等；（二）地理错误，包括政区概念错误、地名混淆、古今混用、方位错乱等；（三）职官错误，包括职官混称、随意杜撰等；（四）历法错误，包括错写日期、干支错位等；（五）其他错误，包括年龄误差、名物描写前后矛盾等。这些错误多达八九百处。

综观上述，其实质还是历史演义与历史真实的关系问题，只不过局限在典章制度、历史地理、人物称谓这样一些具体的范畴中罢了。那么如何看待这样一个问题呢？还得从《三国演义》反映历史真实的具体形态的视角来审视，只有进入一定的理论框架才能把握具体规定。我们知道：一部小说的真实与否以及真实程度如何，很大程度取决于小说的创作主体。因为历史真实作为一个构成因素，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创作的全过程，最终纳入审美机制的表现形态予以铸就造型。因此，人们在阅读和欣赏《三国演义》的审美活动中才能感知三国历史的演进和历史人物的风貌。这就是说，《三国演义》的审美时空形态是以反映历史上的现实时空关系为自身的存在方式或表现手段。它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1）小说所反映的历史过程的基本走向和历史框架的基本风貌；（2）小说中所设置的以历史领袖人物为轴心的绝大部分历史人物；（3）小说对历史典章、历史地理、历法干支等历史形式的记录或描述。这三方面都应与历史的记载一致。至于从现实时空形态转换为审美时空形态，小说家需要经过一个艺术感知和创造过程，所建构的审美时空形态，就会同现实时空形态之间出现距离、错位和倾斜，那是艺术上的超越和限制。它既不会引起读者正常时空观念的混乱，也不会因此与历史风貌相去太远。正因为《三国演义》在这方面处理得比较好，才成为众多历史演义中出类拔萃的一部，才成为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如果我们从这一高度审视沈先生的《校理一览表》，就会发现，基本上属于历史小说的真实表现形态的三个方面的第三方面。而这一方面和前两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它一般不涉及小说家在艺术上的超越或限制。相反，越是历史形式上的具体细致微小的方面，小说家越是重视，因为那是历史真实的细胞，越是真实越是典型，越能反映一个时代独特的历史风貌。所以沈本《三国演义》对这些虽小但关系颇大的错讹十分重视。比如据《后汉书·伏皇后纪》中对董贵人的记载，校理出“贵妃乃董承之妹”这一错误，应为“贵人乃董承之女”。这个错误的产生，可能因《董国舅内阁受诏》一回中，汉献帝称董承为国舅，毛本便误为董承是董贵人的哥哥。其实，董承是汉献帝的岳父，而当时的称谓是将岳父母称为舅姑。《礼记·坊记》：“昏（婚）礼：婿亲迎，见于舅姑。”郑玄注：“舅姑，妻之父母也。”由此推理皇帝的岳父便可以称其为国舅。仅以此小例便说明历史小说在历史典章制度、地理方位、官职称谓上的错误，并非是小问题，它直接关涉到当时社会的风情习惯，弄错了，便失去了历史的真实。

文化现象的存在是客观存在的某种可能性的展示，即使错误的东西，也有它形成存在的历史的、文化的、习俗的必然因素。沈先生在《三国演义》普及本中校理出的错误有800多处，毛氏本中校理出900多处。仔细分析这些错误产生的原因，正如沈先生已经指出的：“由于作者知识的局限，由于作者一时笔误或者传抄、刊刻之误而造成的”。

(一) 书写刊刻之误

继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这一版本系统之后，明万历年间又出现一批《三国》刻本，集中在金陵、福建两地，大都是私人刻本，为了赢利，赚钱就印，错讹比比皆是，在所难免。笔误或传抄、刊刻造成的错处，主要表现为文字上的音同字异，或者字形相近，而导致人名、地名、官职上的鲁鱼亥豕，如高唐误为高堂，子扬误为子阳，苑康误为范康，李利误为李别，庞羲误为庞义等，约40多处。加上官职、地名的称谓多字或少字，历法年代记载的误差等，共占全书错误的十分之一。这些都明显属于技术性的问题。

(二) 成书过程之误

《三国演义》从酝酿到成书长达一千多年，而且参与创造者众多，层次各异。特别是三国素材的史传文学系统与俗文学系统在交叉、融合和演进的过程中，形成了题材成分的多元性和艺术描写的不平衡性。其中就包含着由于对历史演义小说如何处理与历史真实的关系，其真实的成分究竟要达到一个什么标准的认识不一，而长期聚讼不已。何况无论《三国演义》哪个版本系统的修订本刊刻本都离不开文人的努力和定夺，他们的知识结构、文化层次、文人习俗就会自然渗透其中。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带来当时不以为意，而今天看来却是错误的东西。比如历史地理名称方面的错误，便与此有关。著名学者谭其骧就曾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旧时代文人对地名往往喜欢用古名、别名，对行政区划和地方官也喜欢用古称，不仅常见于诗文书札，也用以署籍贯、题书名。地名用古名，如称南京为金陵，称扬州为广陵，其实金陵是先秦的名称，广陵是唐以前的名称，宋元以来，这些名称早已不用了。地名用别名，如称泉州为温陵，称无锡为梁溪，其实泉州、无锡从古以来从未叫过温陵、梁溪，都不过是文人为了要风雅而取的别名。政区和地方官用古称，如宋以后根本没有郡，但宋元明清人笔下经常出现郡和太守，实际上所谓郡就是指当时的一州一府，所谓太守指的是当时的知州或知府。因为当时的一州一府之地，大致相当于两汉六朝的一郡，而知府知州也大致相当于古代的郡太守……所以现在我们看古书和旧时代的文字，千万不能看到一个地名或政区名、地方官名，就认为当时实际存在这种名称或制度。”^①“武昌”在唐代前后所指不一，“郢州”是南朝地名，“荆门州”系元代所置，“阆州”、“温州”也是唐代以后的地名，这些都混用在《三国演义》之中。再如历史地理方位的颠倒，耒阳在江陵东南一千里，《演义》却作“东北一百三十里”；益州本在汉中之南，《演义》却写为“西可以吞益州”等。还有官职称谓的混杂，年月干支的混淆等。

比较集中的一个错误，如州、郡、县三级政权机构的混淆，造成一系列与此有关的错误：把行政区与其治所混同，把不同层次的政权机构长官的称谓混同，把不同级别的官府的称谓混同。仅政权机构这一项错误就占总数的10%。在中国历史行政区域的演变中，秦朝在行政区划制度上实行的是郡县两级制，西汉承秦制，东汉也基本如此。只是到了黄巾起义之后，州才逐步由监察区变为行政区，开始形成州、郡、县三级制。三国时代魏有12州，吴有4州，蜀有1州。可以说这是历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变革。政权机构的三级制，强化了对地方的控制，目的是镇压农民起义，但也为豪强割据提供了条件。董卓、公孙瓒、袁绍、袁术、刘表、刘璋等军阀都曾割据一州或数州，称雄一时。三国的形成，说到底就是豪强兼并的结果。

^① 谭其骧：《历代行政区划略说》，《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第51页。

所以说，沈先生对此问题的校理，无论对反映三国时代真实史貌，还是为后人正确地认识和了解那个时代，都是极有意义的。其意义概而言之，便是对历史真实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类错误主要出现在全书 85 回之前，以后便大大减少了。这个现象说明什么？前 85 回写了不到 40 年的历史，主要反映了三国鼎立的形成和发展；后 35 回叙述了长达 58 年的历史，主要反映了三国鼎立局面的瓦解和统一的历史过程。这两个阶段时空包含的历史内容从取材来看，前者不仅有史传文学提供的，而且有丰富的俗文学成份；后者俗文学提供的成份大大减少，小说家主要依靠史传文学再现了三国时代的历史风貌。这就从中透露出成书的一些胎息，取自史传文学的部分相对于俗文学提供的成份，在政权机构上的错误自然地减少了。因为史传文学毕竟比俗文学对历史记录要规范、要严格，而且它符合《演义》版本发展的规律：“演义的演化，总是沿了一条公同的大路走去的，便是愈趋愈近于真实的历史，愈趋愈远于民间的传说。”^①《三国演义》成书的总趋势是小说家总是依照史传文学的历史走向、历史框架、历史形式去规范取舍俗文学提供的成份。

三、校理是一项版本的系统工程

沈先生校理《三国演义》的几个主要版本，有普及本、毛氏本、嘉靖本和李卓吾评本，至评点本问世，其校理形成一个系统工程

（一）系统工程的内在联系。从根本的演变来看，嘉靖本、李卓吾评本、毛宗岗修改本是《三国演义》版本史上最重要的几个版本，最早的嘉靖本距李卓吾评本至少在半个世纪以上，距毛宗岗修改本达 150 多年。这段时间是《三国演义》版本演化的重要时期，而且这三个重要的版本清晰地记录了版本变异的过程。《三国演义》版本研究是三国学的重要组成和必不可少的基础，对这样三个重要版本的校理，无疑为版本学的深入探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沈氏的这一系统工程对《三国演义》的版本研究提出了具有开拓性的新见解，要而言之，第一，“《三国志传》的祖本比较接近罗贯中的原作，甚至可能就是罗贯中的原作”；第二，“《三国演义》的版本主要有三个系统：（1）《三国志传》系统；（2）《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3）毛本系统。”此外，“李卓吾评本”虽然属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但因其承先启后，可视作为一个重要的子系统。第三，其演进的主要轨迹是：罗贯中原本——周曰校本或夏振宇本——“李卓吾评本”——“毛本”。这些新探索新见解不仅改变了“明代各种版本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的传统看法，而且为今后《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廓清基本方向和路数作出了开拓。

（二）系统工程体现的整体思维。这几部校理本的内容都围绕着人物称谓、历史地理、政区官职、历法干支等问题，也就是历史文化的范畴。在这样一个广阔而漫长的大前景下，一点一滴地校理，条分缕析达八九百处，真可谓散为万殊，聚则一贯。如“落凤坡”的注释：“落凤坡：虚构的地名。今四川德阳市罗江镇附近有落凤坡，传为庞统中箭身亡处。据《三国志·蜀书·庞统传》，‘进围雒县，统率众攻城，为流矢所中，卒’。可见庞统死于落凤坡系出虚构。”这个落凤坡，清代著名诗人王士禛也搞不清虚实，鲁迅先生曾以他为例，说：“他有一个诗的题目叫‘落凤坡吊庞士元’，这‘落凤坡’只有《三国演义》上有，别无根据，王渔

^① 郑振铎：《三国志演义的演化》，《郑振铎文集》第五卷，第 221 页。

洋却被它闹昏了。”^①这种在史实与虚构二者之间明确地诠释，在沈氏校理本中随处可见，用以指导读者鉴赏。严格说，这些零散的东西，只有纳入沈本系统才能看出其整体思维。也就是说，沈本系统始终贯穿着一个准则：把握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区别与联系，点点滴滴都源于这一内涵，深入浅出，连类征引，圆通自如，形成自明自律的校理系统。这种举小以贯大，推末以至本之功，不仅要了解熟悉典章制度、历史掌故、天文地理、经史子集，而且要掌握历史民俗、乡谈俚趣、俗谚隐语、神话传说、星象占卜等。沈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深厚的功底、不懈的努力，解决了前人和时贤许多不曾解决的问题，终于达到了《三国演义》版本前所未有的学术品位。

(三) 系统工程既是校理也是阐释和鉴赏。钱钟书先生对古籍的校注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不同于重词语训诂、名物考释、校勘补正的传统做法，而把校注与鉴赏相结合，校注的过程即是阐释、鉴赏的过程，常常在校注中画龙点睛地道出了自己的艺术见解。他说：“倒是诗词、笔记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益人神智的精湛见解，含蕴着很新鲜的艺术理论，值得我们重视和表彰。也许有人说，这些鸡零狗碎的小东西不成气候，而且只是孤立的、自发的见解，够不上系统的、自觉的理论……所以，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那是一种粗浅甚至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疏忽的借口。”^②钱先生自己的著作就体现了这一经验之谈，那些鲜活灵动的片言只语，囊括中西，穿越学科，显示丰厚的内涵，其精妙深刻令学者们也惊叹不已。我这里指出这些，目的是想说沈先生校理《三国演义》时也体现出了这种精神，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例如第六回对“荥阳”的注释：“荥阳：县名，属司隶州河南尹。治所在今河南荥阳东北。按：荥阳在洛阳以东，董卓西迁长安，不应经过荥阳。历史上曹操曾与徐荣战于荥阳，但未追击董卓。《演义》将二事糅合。”此条前面是注，后面是艺术鉴赏的阐释，三言两语指明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的区别，简明而通俗。别小看这只言片语，倘若没有对《三国演义》精深的研究，恐怕很难写出这么几句艺术见解。这对读者则起到指导的作用，从一块秦砖汉石上看到万里长城的形势。再如第二十七回对“汉寿侯”的注释：“汉寿侯：应为‘汉寿亭侯’。汉代列侯按食邑大小分县侯、乡侯、亭侯三等。汉寿侯系县侯，汉寿亭侯则系亭侯。此为求回目对仗而略去‘亭’字。”真是说得透亮，如同窗户纸一捅便破。

总之，我认为，沈先生的贡献，不单是对四种主要版本的《三国演义》的校理和点评，而且在于其校理工作带来的学术走向产生的意义。即它为民族文化的大普及、大推动、大解放，为书斋里的学者们探索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如何弘扬民族文化，做出了可贵的先导和不懈的努力。新时期文化的繁荣，依赖于学者的上层文化与人民群众的通俗文化的交流、撞击和融合而产生的民族的精粹。只有当人民掌握了它，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弘扬民族文化，才能形成我国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础。沈先生在《三国演义》版本史上开拓出的新路，其里程碑的意义正在于此：功在当代，泽被后世。

郑铁生 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理事，天津外国语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万本根)

①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四讲。

② 钱钟书：《读〈拉奥孔〉》，《旧文四篇》第26页。